

● 中国古代文学

孟浩然仕进思想新论

宁松夫

(襄樊学院 中文系, 湖北 襄樊 441003)

[作者简介] 宁松夫(1944-),男,湖南邵东人,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,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。

[摘要] 仕进思想是孟浩然思想的主流,孟浩然仕进思想的形成有着诸多主客观的原因,这些原因主要有家世重儒的熏染,对自己才德的自信,襄阳名人的激励,盛唐时代的鼓舞以及交友濡染的影响。

[关键词] 孟浩然;思想主流;仕进思想

[中图分类号] I206.2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671-881X(2003)05-0603-05

孟浩然的思想大体有两个方面:一是积极用世的仕进思想,二是消极出世的归隐思想。仕进思想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。对孟浩然的仕进思想,现当代研究者虽然有所论及,但至今未有人撰写专文正面进行深论,本人试就此论题发表拙见,以就教于方家。

一、仕进思想是孟浩然思想的主流

仕进思想在孟浩然思想中所处的地位如何?这个问题古今论者看法不一。

在唐人王士源的《孟浩然集序》里,孟浩然不是一个寻求仕进的学人,而是一个“好乐忘名”的名士。韩朝宗相约入朝引荐他,及期,他竟然为了饮酒之乐而公然拒绝与韩入朝。《旧唐书·孟浩然传》说孟浩然“年四十来游京师,应进士不第,还襄阳。张九龄镇荆州,署为从事,与之唱和,不达而卒”。只说他具有应试求仕的思想。《新唐书·孟浩然传》承王士源“好乐忘名”之说,并载一事:孟浩然被王维私邀入内署,偶遇玄宗,帝问其诗,自诵所为,至“不才明主弃”之句,帝曰:“卿不求仕,而朕未尝弃卿,奈何诬我?”因放还。认为孟浩然无求仕之想。

自孟浩然的同乡好友张子容起,至皮日休为止,包括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在内的20位诗文家所作的32篇关涉孟浩然的诗文中,没有一篇认定孟浩然有热衷功名的思想。仅王维《送孟六归襄阳》诗中,“好是一生事,无劳献《子虚》”之句,从侧面透露出孟浩然有“献赋”求仕之想。另有符载《从樊汉南为鹿门处士求修墓牋》一文中有“仗儒杰立”一句,好似隐含了孟浩然有儒家积极入世之心。

上述事实说明,在历代史家、诗家眼里孟浩然只是个才高德重的隐者。

在现当代研究者心目中,情形就不一样了,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孟浩然有入世仕进的思想,但当论及这种思想时,所持观点又大相径庭。闻一多先生的观点是:“孟浩然虽然身在江湖,他的心并没有完全忘记魏阙。”^[1](第27页)朱起予先生指出:“现在某些学者持孟浩然热衷仕途之说,殊可怀疑。”但他同时又指出:儒家的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的修身济世思想也总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孟浩然。两位先生都认为在孟浩然的思想里有仕进的一方面,但绝不是主流。与此相反,陈贻焮先生认为:“不要以为把

“骨貌淑清,风神散朗”的孟浩然说成热衷仕进很可怪。恰恰相反,如果只根据现象就断定他天生清高出尘,那才真可怪。……孟浩然用世的心情是殷切的。”李景白先生明确指出:“孟浩然尽管以隐逸闻名,以游山玩水著称,而思想深处并不是那么静穆和恬淡,倒是相当热衷功名仕进的。”

关于孟浩然的思想,我的观点是:隐逸思想只是他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,仕进思想才是他思想的主流。

存在决定意识。孟浩然一生隐居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他必然具有隐逸思想。但是隐逸思想在孟浩然的一生中,自始至终都没有占居主流地位。他一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。前期(40岁游京师以前)的隐居是“为仕而隐”,是在为“年四十来游京师,应进士”^[2](第5050页)作准备,有他自己的诗作为证:“少年弄文墨,属意在章句”(《南阳北阻雪》)。唐代是以词章取士的时代,词章的优劣,往往决定士子的取用与否。所以孟浩然要去“弄文墨”,以求一朝金榜题名。既是“为仕而隐”,隐逸思想就不是主流。后期的隐居是“不得已而隐”,即在应进士不第后求仕不成的窘境中不得不隐居,也有他自己的诗为证:“寂寂竟何待,朝朝空自归!……当路谁相假,知音世所稀。祇应守索寞,还掩故园扉。”(《留别王侍御维》)诗中告诉我们,诗人之所以回到故园隐居,是因为“当路”的“知音”不帮助引荐的结果,是迫不得已的。

在对待仕与隐的问题上,孟浩然与同被称为隐逸诗人的陶渊明有着明显的区别。陶渊明步入中年后,内心处在仕与隐的矛盾之中,但他在处理这个矛盾时,往往取归隐而舍仕进,故而有“五仕五归”之举。41岁辞令归田,直至仙逝,尽管在心灵深处对“大济于苍生”(《感士不遇赋》)的壮志未能实现深感遗憾,但于仕宦却一直坚持不屑一顾的态度,且先后拒绝朝廷征诏著作郎和著作佐郎。可见,他的归隐是真心的、自觉的、完全不同于孟浩然的身隐田园、心怀魏阙。究其原因,乃是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“质性”使然。“密网裁而鱼骇,宏罗制而鸟惊。彼达人之善觉,乃逃禄而归耕。”(《感士不遇赋》)陶渊明在世的几十年,三易朝代,几次废立篡弑皇帝,并且每次大变革都无不伴随着一场大清洗和大屠杀。他是“乱也看惯了,篡也看惯了”^[3](第391页),险恶也看怕了,因此对政治上的升沉得失也就自然看得淡了。关于陶渊明的质性,陶诗中多有吟咏,如“质性自然,非矫厉所得”(《归去来兮辞》)、“我爱其静,寤寐交挥”(《时运》)、“少无适俗性,性本爱丘山”(《归田园居五首·其一》)等等。性之所好,无可改变,即使身在官场,他也总在心念“适性”,“羁鸟恋旧林,池鱼思故渊”(同上)就是这种心志的佐证。

在处理仕与隐的关系问题上,孟浩然与王维也有明显差别。王维的仕与隐,前期是交错进行的,后期是相伴相随的。他开元十六年隐居淇上,是仕途不得志的愤然而隐,他作于淇上的《偶然作六首·其三》就反映了这种心态,诗云:“家贫禄既薄,储蓄非有素。……爱染日已薄,禅寂日已固。忽乎吾将行,宁俟岁云暮!”其隐居的目的是“以退为进”。他开元二十二年向张九龄献诗(《上张令公》)求仕后即隐居嵩山,是为重新出仕而隐。他开元二十九年隐居终南山,是慑于朝中李林甫专政,政治险恶,为避患而隐。从天宝元年至终南山复出官左补阙后,至天宝十四年,安史之乱为止,他一直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。一方面在朝为官,一方面每遇公闲休假,便隐居蓝田辋川,醉赏其山水风物。何以会如此呢?他的《赠从弟司库员外綬》诗道出了个中原因:“既寡遂性欢,恐招负时累。……皓然出东林,发我遗世意”。即是畏祸心理所致。半官半隐,若即若离,正是逃避来自朝奸祸患的好办法。概言之,在王维那里,退隐或是“进仕”的手段,或是“保仕”的法宝。这不同于孟浩然的志在求仕、不遂乃隐。

我们说仕进思想是孟浩然思想的主流,这是符合孟浩然一生思想的实际的,这个实际就是孟浩然的诗歌所反映出来的实际。

“诗言志。”纵观孟浩然200多首诗歌,明显地反映出求仕愿望的就达50首之多,其中强烈反映出这一愿望的有23首。这些诗作,有的直抒胸臆,正向表达自己强烈的求仕之心,如“冲天羡鸿鹄,望断金马门”(《田园作》)、“俱怀鸿鹄志,共有鸛鸽心”(《洗然弟竹亭》)、“常恐填沟壑,无由振羽仪”(《晚春卧病寄张八》)、“魏阙心恒在,金门诏不忘”(《自浔阳泛舟经明海》),等等。有的通过写自己求仕未遂而冷对官场,甚至要与官场决绝而归隐山林田园,从反面表达自己强烈的仕进之想。如“遑遑三十载,书剑两无成。山水寻吴越,风尘厌洛京。扁舟泛渤海,长揖谢公卿。且乐杯中酒,谁论世上名”(《自洛之越》),此诗告诉我们:诗人之所以“不论世上名”,是因为“遑遑三十载”地求仕而未能遂愿。“苦学三十载,闭门汉

江阴。用贤遭圣日，羁旅属秋霖。岂直昏垫苦，亦为权势沉。……寄言当路者，去矣北山岑”。（《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》）显而易见，诗人是在“苦学三十载”地追求仕进的愿望因“权势沉”而落了空，才“去矣北山岑”的。“吾道味所适，驱车还向东。……拂衣从此去，高步蹑华嵩。”（《东京留别诸公》）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（728），当时诗人滞留长安应试、求仕都未能遂愿。不难看出，诗中向东京诸位官友发出的拂袖而去、隐居山岑的决绝声明不是情愿的，而是出于无奈。

有一首孟浩然苦苦道出了自己大半生求仕不得志的厄运的诗，这就是《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》。这首被陈贻焮先生称为“可看作他的自传”的诗，始写少年时慕陶的志趣——“尝读高士传，最嘉陶征君。日耽田园趣，自谓羲皇人”；继写壮年时的心志——“中年废丘壑，上国旅风尘。忠欲事明主，孝思侍老亲”；末写晚年迫不得已的人生取向——“因声谢同列，吾慕颍阳真”。还有一首诗则比较全面而透彻地表白了诗人求仕的方方面面，这就是《书怀贻京邑同好》。诗中告诉我们，诗人的求仕是有家庭根源的，即“家世重儒风”；是作了才学准备的，即“词翰颇亦工”；是有现实原因的，即“甘脆朝不足，箪瓢夕屡空”；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，即“执鞭慕夫子，感激怀毛公”；同时也是定好了原则的，即“当途诉知己，投刺匪求蒙”；并且是有急切期望和难耐等待之心的，即“秦楚邈离异，翻飞何日同”。这首诗简直就可以看做一分“求仕自荐书”。

一个以山水诗著称于世的诗人，在自己的诗作里，有如此多的诗篇用如此复杂而激愤的感情、在如此多的方面、在如此漫长的人生历程里言仕进，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仕进思想是他思想的主流吗？

二、孟浩然仕进思想的形成

孟浩然少年时就有入仕之志，但一直未能得志，直到老之将至，还念念不忘入仕。那么他如此一以贯之的仕进思想又是怎样形成的呢？要言之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。

一是家世重儒的熏染。关于孟浩然一生的家世和所接受的教育情况，从孟浩然的诗里可以窥见一斑：“维先自邹鲁，家世重儒风。诗礼袭遗训，趋庭霁末躬”。（《书怀贻京邑同好》）即他的先祖来自孔孟之乡——邹鲁之地，世代接受了儒家诗礼之教，崇尚儒家的风范。从孟浩然一生思想主流的实际看，他在仕进思想方面确是接受了儒家的影响。

从求仕的心态来看，他与孔子一脉相承。孔子前半生周游列国汲汲于求仕，其求仕的心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：“我待贾者也”、“吾岂匏瓜哉？焉能系而不食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、“君命召，不俟驾而行”（《论语·乡党》）。孟浩然诗中的“枳棘君尚栖，吾岂匏瓜系？”（《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》）、“魏阙心恒在，金门诏不忘”（《自浔阳泛舟经明海》）、“三十犹未遇”（《田园作》）所反映出的急于求用的心态，与孔子如出一辙。从对入仕的认识来看，孟浩然的认识也与儒家的认识几趋一致。《论语·微子》里有一段子路与孔子谈论“隐士”的对话。子路曰：“不仕无义。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；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洁其身，而乱大伦，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”在儒家看来，有能力入仕济世者，若隐而不仕，是不义的。孟浩然在岳州写给时被贬为岳州刺史的张说的《洞庭湖赠张丞相》诗中，有“欲济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”的诗句。诗中这种不入世为仕即“耻圣明”的认识，不正是来源于儒家“不仕不义”、“君臣之义”不可废的仕进观吗？

由于求仕的成败，往往不决定于求仕者本身而决定于当政者，因此孔子给自己定下了一条求仕的原则：“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”这条原则对历代文士有很深刻的影响。孟浩然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苦心求仕而未能仕进的情况下，在不少的场合里表示过要放弃求仕而归隐山林田园的意愿，溯源其意，似也源于“无道则隐”。

二是襄阳名人的激励。襄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，历代多为州、郡、道、府治所。唐代襄阳为襄州治所，也是山南东道首府所在地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这里的政治熏染比较强烈，历代政界名人的尊贵地位和功名以及其科考、仕进的历程常常成为父母师长训诫子弟的话题，所有这些，无不给天资聪

慧的少年孟浩然以立志求功名的激励。孟浩然的“吾昔与尔辈,读书常闭门”(《入峡寄弟》),“少年弄文墨,属意在章句”(《自浔阳泛舟经明海》),“少小弄书剑”(《伤岷山云表观主》),“俱怀鸿鹄志”(《洗然弟竹亭》)等诗句,反映出的少年孟浩然立志苦学的动力和远大的志向,从某种程度上说,就是受襄阳历代政界名人的激励所致。

襄阳的历代政界名人多为才学之士,多是通过科考或荐贤入仕的,他们仕进以后,或官高位显,或治政有方,或勤政爱民,总之不少留有令名,为民众深深怀念。晋代的羊祜、杜预镇襄阳期间,深爱其民,因而深得民心。羊祜去世后,襄阳人为了纪念他,在岷山建祠立碑。杜预去世后,襄阳人在岷首山修“羊杜祠”,岁时并祀羊祜、杜预二位英灵。还有晋代的山简,镇襄阳期间,也留下了不少美谈。这些人和事,对于有志于功名仕进的孟浩然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。

在襄阳历代政界名人中,羊祜是孟浩然心中的偶像。孟浩然多次吟咏羊祜:“羊公有令名”(《送韩使君除洪州都曹》),“羊公碑尚在”(《与诸子登岷山》),“岷山羊公爱”(《送王昌龄之岭南》),“叔子(羊祜,字叔子)神如在”(《卢明府九日岷山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》),“羊公岷山下”(《初春汉中漾舟》)。在孟浩然的心目中,羊祜不朽的功名政绩和高雅的生活情趣,都是值得效法的。

杜预武略超群,曾被誉为“杜武库”,孟浩然诗歌中吟咏杜预的诗尽管只有一联:“释子弥天秀,将军武库才”(《与张折冲游耆阇寺》)。但在仅此一联中却表达了对杜预名贯一世的军事才能的钦慕之情。

晋代的山简也是一位为襄阳人世代怀念的“镇襄阳”的将军,孟浩然在诗歌中六咏山简:“山公常醉习家池”(《高阳池送朱二》),“山公兴未阑”(《卢明府九日岷山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》),“山公来取醉”(《宴荣二山池》),“山公能饮酒”(《张七及辛大见寻南亭醉作》),“谁道山公醉”(《裴司士员司户见寻》),“停杯问山简”(《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》)。

还有一位东晋襄阳籍人氏习凿齿,尽管在异地为官,但从孟浩然在《齿坐呈山南诸隐》诗中吟咏他的诗句“习公有遗坐,高在白云陲”、“从来抱微尚,况复感前规”看,孟浩然对他敬重有加。

总之,从孟浩然上述诗句所反映的情、志、趣来看,他对襄阳历史上的这些功名仕进有成的名人是情有独钟的,并且是把这些名人当做自己的人生楷模来吟诵和仿效的,据此,这些名人在功名仕进上对他的激励、促进作用,也是足可以从中见出的。

三是盛唐时代的鼓舞。孟浩然的一生都处在盛唐时代,正是这个繁盛一时的时代鼓舞了他的仕进之心。盛唐时代经济繁荣,国力强大。杜甫曾写过一首咏开元盛世的诗《忆昔》,诗云:“忆昔开元全盛日,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廩俱丰实。九州道路无豺虎,远行不劳吉日出。”国家强大,各方面的事业都兴盛发达,需要大量的人才参与其中,这就为士子提供了施展才华、实现政治抱负的广阔舞台,因而也就极大地鼓舞了包括孟浩然在内的士子们的仕进之心。

盛唐时代注重选贤举能,且用人环境相对比较公平。唐玄宗用人有一条原则,就是“官不滥升,才不虚受”。在用人的具体操作上,唐玄宗有一条受到史家的称许,就是善于任用丞相。姚崇、宋璟、张说、张九龄都是唐玄宗委任的善于识贤用贤的丞相。张说“敦气节……喜推藉后进……善用人之长,多引天下知名士,以佐佑王化”^[4](第4410页)。张九龄提出的选士、用人主张,对士子的仕进思想有更大的激励作用。他倡导古之选士法,说“古之选士,惟取称职,是以士修素行,而不为微幸,奸伪自止,流品不杂”^[4](第4426页),并主张“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,高下有次,则不可以妄干,天下之士,必刻意修饰”^[4](第4427页)。这些贤相都明于用人之道,且常有荐贤之举,如张说在“正除中书令”后,就荐举了孟浩然,此事《唐诗纪事》卷二三有记载:“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,令诵所作。”如张九龄开元二十二年回朝官中书令后,就荐举王维入朝官右拾遗(据赵殿成《王维年谱》)。在这些贤相的影响下,不少朝廷命官也都纷纷为朝廷荐贤,如韩朝宗就是当时荐举寒素的名臣,“他喜识拔后进,尝荐崔宗之、严武于朝,甚得当时名士推崇”^[8](第128页),因而受到不少士子的干谒和褒扬。李白在《与韩荆州书》中借“天下谈士”之语“生不欲觅万户侯,但愿一识韩荆州”对他的赞颂就是一例。

盛唐时代是一个重用人才的时代,孟浩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文士,当然要受到这个时代的仕进潮流

的裹挟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闻一多. 唐诗杂论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8.
- [2] 刘 昉. 旧唐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75.
- [3] 鲁 迅. 鲁迅全集:第二卷[M]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83.
- [4] 欧阳修. 新唐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75.
- [5] 徐 鹏. 孟浩然集校注[M]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89.
- [6] 朱起予. 孟浩然隐逸趣尚论[J]. 苏州大学学报(人社版), 1992, (2).
- [7] 陈贻焮. 谈孟浩然的“隐逸”[N]. 光明日报, 1954-08-22.
- [8] 李景白. “孟浩然遇唐明皇”事质疑兼论孟浩然的功名仕进思想[J]. 社会科学, 1984, (1).
- [9] 陈贻焮. 孟浩然诗选后记[J]. 文艺论丛, 1980, (10).

(责任编辑 何良昊)

On MENG Hao-ran's Thought of Desire for Feudal Official

NING Song-fu

(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& Literature, Xiangfan College, Xiangfan 441003, Hubei, China)

Biography: NING Song-fu (1944-), male, Associate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& Literature, Xiangfan College, majoring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.

Abstract: The desire for feudal official is an essential aspect of MENG Hao-ran's thought. There wer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auses in the formation of Meng Hao-ran's desire for becoming a feudal official, including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, self-confidence in his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, stimulation of well-known people in Xiangyang, encouragement of the flourishing Tang Dynasty and influence of his friends.

Key words: MENG Hao-ran; essential aspect of thought; idea of seeking feudal official